

网络传播视域下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 许智超 何溢诚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台湾青年联合会,台湾 台北 10557)

【摘要】台湾当局恶意阻挠,交流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和分歧,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分化严重,这些使两岸青年交流面临一定困境。互联网已成为台湾青年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而“数位原民”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具有多元、即时、去中心化等特性,给两岸交流带来新的机遇。应建立共同和共通的网络平台,同时以网络交流为基础,连接线下活动,形成“线上串连线下”的机制,基于青年的“想要”与“需要”建立交流对话的桥梁,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建立双边的集体性记忆和生活上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网络传播 两岸青年 融合发展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9.03.008

一、两岸交流发展现状

近年来,由于台湾岛内的经济形势总体上不太景气,社会运动开始层出不穷,其中青年的不满与焦虑严重影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郑剑认为,2014年台湾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标志性事件,青年世代的不满就此爆发,而“时代力量”的诞生意味着这种“新敌意”的政治代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夺得深绿的选票,见缝插针、无限上纲,两岸关系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中断了过去海峡两岸致力规划的和平发展进程,增添了两岸脱稳生变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1]。实际上,蔡英文上任后,两岸交流顿时陷入停滞,不仅官方的协商沟通机制中断,不是“已读不回”就是“相互不理”,而且从2016年5月20日开始,对文化、政治、教育、青年、体育等领域的交流都设置重重阻碍,2018年更因美国出台《台湾旅游法》《国防授权法》遭批“挟洋自重”,似乎有走向更激烈对抗的趋势。根据台湾竞争力论坛最新的民调显示,由于台湾当局接连被4国“断交”、“东亚青运”主办权被取消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对蔡英文当局施政的不满意度已经达到64.1%,其中更有61.7%的民众不满意两岸关系现状,显示出蔡英文执政下的两岸关系已经让台湾人民普遍不满^[2]。与此同时,蔡英文当局执政下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好感却逐渐增加,尤以台湾知名的《天下》杂志调查最为各界所瞩目,不但20-29岁的青年世代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从1.1%提升到4%,30-39岁

收稿日期:2019-02-21

作者简介:许智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台湾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两岸理性交流论坛发起人,主要研究台湾新媒体发展、互联网政治和两岸青年交流;

何溢诚,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世新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政治传播、两岸关系、选举分析。

的被调查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比例也从 27.3% 增长到 36.7% ,而愿意赴大陆工作者则创下 4 年来新高 ,高达 37.5%^[3]。台湾竞争力论坛与《天下》杂志皆为具有代表性的媒介 ,种种调查皆显示 ,两岸交流和融合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即使民进党当局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实施分裂主义的行径 ,使海峡两岸的对峙逐渐走向白热化 ,台湾部分人士也通过一系列的“正名运动”造成两岸纷扰不安 ,但由于岛内经济状况不佳 ,大量的台湾民众仍意欲赴大陆就业和发展 ,尤其“天然独”世代的西进登陆更是令人瞩目。在这种既疏离又融合的现实背景下 ,本文力图梳理当今两岸交流的情况 ,通过分析历史原因、政策导向与台湾当局对台湾青年的影响 ,以及青年参与互联网公共事务的常态化 ,揭示目前两岸交流遇到的阻碍与困境 ,进而探讨改进的方向和机遇 ,以及如何通过加强互联网交流来促进两岸青年群体的融合。

二、两岸交流的困境 “天然独”青年世代

台湾在 2008 - 2016 年间发生不少社会运动 ,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因此不断调整。由于前述社会运动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运动 ,十八大后大陆更加重视台湾青年工作 ,出台了从“三新一青”(中小企业、中低阶层、中南部民众与青年) 到“一代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 ,包括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31 条”等在内的一系列惠台措施。这些包含体验式交流、学习、实习和就业、创业、生活“同等待遇”等的全面政策 ,使得两岸交流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青年群体身上。然而 ,上述交流工作虽然主要以台湾年轻世代为主体 ,但却忽略了互联网对于新世代的影响 ,由此产生一厢情愿的政策认知与想象 ,实际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一) 交流模式的结构性问题

两岸结束对立以来 ,历经了接触、磨合再到频繁交流的过程 ,然而在交流的模式上 ,当今确实面临不少结构性的问题 ,尤其在青年交流领域明显可以看到台湾年轻人受到忽略和被边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两岸开始推进交流和互动 ,根据官方和民间参与程度的不同 ,交流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委托模式、自主模式与协同模式。委托模式指的是交流初期海峡两岸以官方为主来搭建平台 ,民间辅助和配合参与的交流模式。自主模式意指由民间自主发动 ,带动官方定位导向的交流模式。协同模式则是融合上述两者的交流模式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整合资源发挥最大效益^①。上述三种交流模式经常受到各界的讨论和褒贬。委托模式被人们认为容易流于形式 ,尽管有海协会与海基会进行业务推动 ,但交流与互动往往沦为表面文章 ,受到形式主义和官僚色彩的影响 ,交流的目的常常难以完全实现。自主模式体现在与日俱增的两岸民间团体交流中 ,两岸通过不同层次与深度的互动来进行交流 ,深入当地认知和理解彼此的差异 ,增进共同的文化认识。与委托模式相比 ,自主模式较少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 ,然而 ,百花齐放的民间组织亦存在严峻的结构性问题 ,特别是大规模的一条龙业者遭到大小不一的批评 ,包含行程费用前后不一、安全性堪忧、政商结构不清、买办垄断等 ,给两岸交流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琼认为 ,目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 (1) 交流松散和不均衡 ,尤其在地域、渠道和群体方面存在局限性; (2) 交流规划性不强、深度不够 ,存在一定的盲目化与形式化的倾向; (3) 交流的类别和形式单一 ,整体上缺乏创新性与持续性^②。实践中 ,在两岸交流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 ,两岸青年组织和举办了大量的“论坛”“营队”“研讨会”等等 ,但多数互动交流都停留在表面与形式上 ,台湾青年赴大陆后通常经由短时

① 刘灯钟《“委托模式”、“自主模式”与“协同模式”》,载 2016 年南澳论坛论文集。

② 王 琼《目前两岸青年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载 2016 年南澳论坛论文集。

间接触大陆的人、事、物,在几天的相处之中或许可以拉近双方因为时空背景差异而产生的心理距离,但可惜的是,活动结束后无法更进一步地交流和继续保持联系,活动当下产生的热度亦逐渐冷却。委托模式、自主模式有其局限性,协同模式正好弥补了前两种模式的结构缺陷。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资源整合,协同模式能够突破委托模式与自主模式的困境,除了避免形式主义的问题外,亦不存在民间主动交流的弊病,但这种新兴的折中模式的成效仍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而且在目前两岸官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必然会遇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二) 青年交流的困境与媒介

除了前述交流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外,台湾青年赴大陆交流和发展还面临其他方面的困境。基于经济诱因,西进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确实逐年增加,但随之而来的衍生问题层出不穷,诸如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不足、信赖保护成本过高、水土不服等对青年不利的各种因素,都会增加青年赴大陆交流的难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楠指出,现阶段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对大陆认识不足”,年轻缺乏社会历练以及面对新事物时信心不足,无疑是众多台湾青年对西进大陆持观望态度的原因。另外,在大陆的台湾青年是否“融入大陆社会”亦是产学界关心的焦点^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根据其调研结果认为,台湾青年融入大陆社会的过程,并非简单遵循“从经济到身份”的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然而由于两岸在政策法规、风俗习惯、民情环境甚至三观上的不一致,融入过程中都会遇到大小不一的困难^②。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两岸关系的构建中扮演的角色超出想象,媒体所形塑的“脑海中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缺乏有效媒介来相互了解的两岸青年,往往会因为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信息不对称的传播而产生误解和分歧。在媒体呈现出来两个相异的舆论场中,同时各有不同立场和倾向的媒介互贴标签,进行对抗与炒作双方的好坏,媒体基于自身的立场,差异化地塑造对方的刻板印象或与事实完全不同的样貌,例如,在台湾地区即存在所谓蓝绿与统独之争,两者之间水火不容^[4]。由此可见,青年尤其是台湾青年在认识海峡两岸时,多半由于媒体刻意放大或缩小、建构扭曲失真的“媒介现实”、形成“社会现实”的误区,而造成偏听与独断,因此无法真正全面、独立地认识大陆的“客观真实”景象。

(三) 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紊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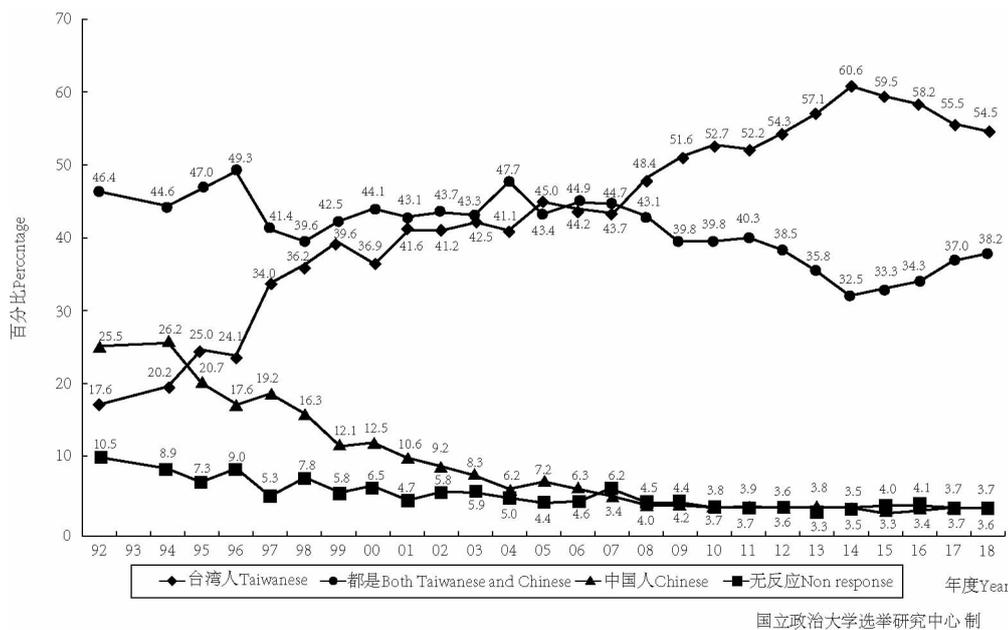
受李登辉、陈水扁一系列“去中国化”政策的影响,台湾民众逐渐产生新的身份认同概念,在大中华概念与本土概念的意识斗争下,后者的话语权有旁落的趋势,前者则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不分族群的共通性认识。对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张宝蓉指出,台湾青年所谓“台湾人”身份所蕴含的民族与种族观念正在消失,想象的共同体、“族群”为主的新型价值观正在形成。经过一系列的文化身份建构,“原住民”之概念正在成为台湾族群文化的重要图腾,从而慢慢被台湾人认为是重要的认同资产。而台湾在文化政策、政治生态、经济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教育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台湾青年世代(90后世代为主)的集体认识、历史记忆、政治认知、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等的群体特性也逐渐改变,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多样性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5]。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去中国化”运动,从文化上、教育上、历史上甚至经济上,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李登辉都力求摆脱与大陆的一切联系,其中“戒急用忍”的方针与“南向政策”最为有名。但二十余年后,“戒急用忍”不但没有阻挡台湾人赴大陆发展,“南向政策”更是兵败如山倒,其恶劣后果不只是台湾政经情势的恶化,台湾人在认同上的断裂感更造成了当今两岸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

① 谢楠《台湾青年西进大陆发展存在的问题》载《两岸关系:新常态与新模式》2017年第九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② 陈超《台湾青年融入大陆社会的问题》载《两岸关系:新常态与新模式》2017年第九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分化严重,对“中国人”“台湾人”等的认同,在不同政治势力与外在因素的催化下不断转化、调和。尤其是新生代在相对混乱的政治背景下成长,他们由此产生迷茫感、混淆感、焦虑感和紊乱感等,让岛内的身份认同不像威权时代那样集中。因应民主化、本土化、在地化与国际化,90后世代具有多重身份认同,与过往的世代认知存在诸多差异。当今台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正逐渐朝向“我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方向发展,对于国家认同中的政治意涵的认知更加“混合化”,不少人认为“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台湾人”,甚至一部分人产生“独立国家”的思想萌芽,因此鼓吹所谓的“正名运动”。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自1992年至2018年,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逐年降低,最终长年在3%—4%之间徘徊;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比例亦逐年降低,近几年虽然有微幅提高,依然不到39%;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逐年升高至54.5%(见下图)。这说明台湾人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正在逐年减弱,而对“台湾人”的认同以及其他周边延伸认同则逐渐稳固。此外,“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历次调查结果显示,曾经高达98%的年轻世代(20—29岁)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同时有81.9%的人认为台湾未来应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台湾岛内称之为“天然独”世代^[6]。对于台湾“天然独”世代,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曾经指出: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由于出生在台湾、生长亦在台湾,具备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外界不能用传统既有的想法和价值强加在青年身上,而应该放手让年轻世代通过自身体验形成自己看法。但是实际上,“天然独”世代的形成自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与学校教育紧密相关。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图(1992—2018)

数据来源: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7]

张宝蓉认为,台湾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后,将“以人为本”作为其重要核心价值,标举个人主义,此后无论是台湾社会还是教育领域都以“人的主体存在、需要满足和发展”为中心思想与实践导向,由此导致台湾青年的人格具备“个人化”与“独立自主性”的特征。然而,受到强调主体重于客体、个体大过群体的教育改革的影响,青年世代在进入社会后面临诸多困境,而因此参与的“反体制”集体行动则是他们个人化思想和意志的重要表现^[8]。可见,伴随台湾政治

的民主化、校园教育的改革以及台海势力的消长,台湾人对于“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受到多种因素环环相扣的影响,“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与“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占比的变化值得关注。

(四) 台湾当局的阻碍

由于蔡英文上任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海峡两岸从初期的“冷对抗”逐渐走向“热抗衡”,陆客不来、经济制裁、外交摊牌由此接踵而至。新党三杰“共谍”案是两岸青年交流的转折点,此后台湾当局陆续发出许多减少青年交流的声音,给日益增加的赴大陆交流和发展的台湾青年造成诸多障碍。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在2018年3月发表《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之研究》,宣称和代表了台湾当局的立场,从中能够具象体认台湾官方的态度与意涵。该报告明确指出,大陆对于台湾青年的工作模式越来越多元化,并且利用各式各样的优惠措施来进行整合,其背后皆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涵。尤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发布支持“众创空间”的政策后,大陆加速实施产业的整合与转型,而福建省基于地缘优势,积极开展对台工作,吸引台湾人才成为重中之重^[9]。该研究报告针对台湾青年赴大陆交流和发展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解析,从该报告的研究结论可以得知,“政治目的”仍是蔡英文当局的关注焦点,如何防范人才、资金的外流和吸引人才、资金的回流也是其重点所在。

三、青年世代:互联网“数位原民”

(一) “数位原民”的兴起

除了上述两岸交流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去中国化”后的认同错乱与台湾当局的阻碍等,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青年在互联网上长期受到忽视,而实际上新世代的台湾年轻人对互联网的依赖极深,上述几种因素也都深深地受到互联网的影响。随着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台湾青年关心公共事务、进行政治传播与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甚至已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媒介场域。诸多的社会运动深深地影响互联网政治传播与政治参与的发展,而互联网传播也影响着许多议题的走向,成为海峡两岸交流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青年被称为“千禧世代”。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 Marc Prensky 就从传播学的角度,将现代社会的人们区分为“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与“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两者在网络使用习惯与方式上的世代差异显而易见。以“数位原民”来说,90后世代由于从小浸染在网络世界中,其传播工具使用模式具有明显的多元、即时、去中心化等特性,尤其是去中心化的特性让他们习惯通过对各种资讯的辩证与分析来认识世界发展的脉络^[10];另外,他们较容易适应环境与做出改变,尤其是近年来通过网络媒介广泛影响与参与台湾政治,已经逐渐受到各界的重视。

随着BBS、PTT、Facebook、Youtube、Dcard、Instagram、痞客邦等网络平台在台湾的兴起,社会议题百家争鸣,常常通过上述媒介发酵和扩散,进而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巩固、深化与公民运动的兴盛。自下而上地在互联网上讨论公共议题,甚至转化为实际行动来改变政治现状,在台湾已经是经常可见的现象。由于网络传播时代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无论是政治选举还是社会运动都有越来越多的“数位原民”参与其中,例如2013年洪仲丘案事发后,人数多达25万的白衫军走上街头;2014年一些网络组织动员号称50万人的学运。反观“数位原民”,其世代特征极不利于传统的政治宣传,种种新兴媒体的传播力量让大陆先前的对台政策几乎无所着力。实际上,网络政治参与是青年世代参与政治的一种重要行为和形式,“数位原民”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其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会因为事件、地点、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不同,或者议题本身

的不同而不同 2010 年以后在以台湾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中令人瞩目的网军、网红与乡民动员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二) “数位原民”与两岸关系

在两岸青年的交流中,互联网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途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张峻豪表示,两岸关系衍生的相关争议,与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之外是否重视民意和民众参与有关。2008 年国民党执政后,通过签订协议拉动两岸合作,主要聚焦于实体经济层面的交流。进入“深水区”后两岸关系原本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最后却遇到各式各样的阻碍,不仅没有获得经济互利带来政治互信的外溢效果,马英九引以为豪的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也被扣上“倾中卖台”的红帽子,成为国民党在 2014 年的地方选举与 2016 年的“中央大选”中兵败如山倒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台湾社会对于马英九政府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存在疑虑,对于社会利益、分配正义与意见表达的诉求日益强烈^[11]。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参与是指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生活,而由于思维习惯和行为特征与“数位原民”不同,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数位移民”都不太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随着台湾选举逐渐走向网络化与新媒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数位移民”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当然,大陆根据两岸关系的变化,始终与时俱进地寻找着力点以寻求突破,如 2014 年提出“三中一青”、2017 年强调“一代一线”,以及此后开展的“体验式交流”“精准对接”与对台湾青年给予“同等待遇”的安排,都是重视台湾青年利益与需求的体现。然而如前所述,“数位移民”与“数位原民”不同,前者惯于单向思考,具有一成不变、保守教条、“中心化”与“一元性”的局限,容易滋长形式主义与形成政经分离的不和谐的认知,换言之,他们参与大陆经济发展从而获取红利,在政治认同上却更倾向于分离主义(即所谓的绿色台商);而作为“数位原民”的台湾青年,他们的思想观念仍未定型、可塑性强,思维与行为模式尚具多元融合发展的潜力,尤其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非常强烈,对大陆的发展亦怀抱愿景,希望能够把握机会参与其中,通过互联网平台搜集资讯、发表观点与进行辩论,或者通过互联网舆论来影响决策。这些都是公民表达意见的行动或形式,而互联网公共平台也确实改变了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方式,例如,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开办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即是呼应新世代的需要与诉求的产物。

四、促进青年整合的新方式:平台+共性

海峡两岸在 1949 年分治后,已经形成政治制度、历史记忆以及生活方式明显不同的客观事实。出生于台湾民主化改革之后的 90 后年轻世代,普遍接受了伴随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的“教改”而来的“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加上台海势力的消长与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他们对大陆的逐渐疏离成为一种衍生结果和客观事实。尤其是在身份认同上,调查显示,近年来“台湾意识”逐渐提升和巩固;无论偏向统一者还是偏向独立者皆认识到,年轻人中认为“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近几年有些微的变动),同时部分互联网平台排斥大陆的倾向也日渐增强。不管是由于前述交流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台湾自身的历史背景因素,还是因为其他外在原因,两岸关系确实越来越紧张和复杂,因此,在官方与民间的交流中双方如何进行必要、手段性和开创性的融合,无疑是值得思索的课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两岸必须持续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台湾同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这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台湾青年赴大陆面临的客观性困境。而台湾《中时电子报》则认为,两岸青年交流仍存在极大的改善空间,例如,两岸每年都举办为数众多的交流活动,但绝大部分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尤其多以旅游参访为主要内

容,或者参观大陆硬件建设的迅速发展;每年实际赴大陆交流的台湾学生仅1万人次左右;而且赴大陆交流的青年基本上来自社会中上层,交流的局限性比较明显,绝大部分台湾青年只能通过媒体与网络来了解大陆。因此,互联网时代两岸青年的融合发展,必须重视网络世界的交流,这对于台湾青年认识大陆的真实状况、改变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具有重要意义^[12]。而从“数位原民”的媒介使用来看,海峡两岸的新世代目前在互联网的使用上有较大差异,从搜寻引擎、通讯软件到社交媒体,在使用习惯上具有诸多不同,几乎是各玩各的。台湾青年世代经常使用的Google、Ptt、Facebook、Line、Youtube、Dcard、Instagram等,这些软件和工具大陆的民众皆不使用,大陆常用的是微信、微博、百度、QQ等。媒介的不同导致难以发挥网络新媒体不设限、高互动和无远弗届、天涯若比邻的传播效果。这无疑是造成双方渠道不相通、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信息不对称的后果。因此,促进网络传播时代两岸青年的融合发展,应当从“平台”和“共性”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建设和形成共同和共通的网络平台。大陆应该秉持“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精神,打造海峡两岸年轻人能够共同接受与使用的网络平台,交由青年世代来自自我管理并扩大参与,尤其是要让习惯利用互联网来参与公共事务的台湾年轻人利用该平台来交流对话,由此破除信息的不对称,消弭资讯焦虑与知识鸿沟,发挥“数位原民”的多元性、包容性与易变性,形成与巩固海峡两岸的互信机制与合作默契。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共同网络平台,无疑是手机移动端App“台陆通”。该App经过不断优化和完善,目前已经囊括生活、就学、就业和创业等方面的服务,但是在对赴大陆问题的答疑上明显有所不足,至今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许多即时性或紧急的问题无法立即处理和回复,容易造成台湾人对赴大陆所遇困难求助无门的尴尬局面;另外,该APP的推广传播仅限于两岸交流的圈子内,至今仍没有与两岸各主流网络平台建立链接和合作。

其次,以网络交流为基础,连接线下活动,形成“线上串连线下”的机制。目前,大量的官方论坛、旅游团、参访与研讨会等短期交流,加强了两岸日常生活上的联系,无疑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事先没有在主流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在活动进行时也没有对外即时发布活动的进展情况,事后对活动的资讯更是缺乏统合整理,导致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活动的举办,更不了解活动的意义,因此效果长期不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何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串联?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潘锡堂提出了“青年的‘想要’与‘需要’—串联集体性记忆—生活上的密切联系”的思路,富有启发性:在大陆更加体认台湾政治环境相对多元的同时,基于青年的“想要”与“需要”来建立交流对话的桥梁,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建立双边的集体性记忆和生活上的密切联系^①。为此,一方面,必须深入了解和切实把握当代青年对网络的认知与态度、思考方式和行为取向、网络使用习惯等;另一方面,设计海峡两岸具有共同性的制度,尤其是虑及近年社会运动深受互联网的影响,应更加有效地借助时事议题来进行网络串接,发挥“情境脉络效应”,配合线下的活动,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紧密联系与串联,建立起回应民意的机制^[13],进而让两岸青年——特别是在对大陆的认知上长期受偏颇资讯影响的台湾青年——建立起共同的集体性记忆,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和线下的活动相结合,如此才具有真正的、长期的意义。

共同网络平台的建设和“线上”“线下”的串联需要青年的广泛参与和相互信任,为此,海峡两岸必须建立完整的配套措施,让两岸青年可以在平台上交流经验与心得,同时对于线下的交流也有所助益,既有利于形成正面的舆论力量,又可以对抗破坏两岸关系的“有心人士”。尤其

① 潘锡堂《从青年的“想要”与“需要”出发》,载2016年南澳论坛论文集。

是在面对诸如“周子瑜事件”“东亚青运事件”“欧阳娜娜事件”等特殊突发事件时,在网络平台上的及时沟通与应对,能够避免两岸青年陷入情绪化的误区和产生误解、冲突,甚至被别有用心政客利用。利用网络平台在理想的言说情境下开展建设性对话和两相合作,势必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成果,同时能够大幅改善两岸关系,不管台湾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两岸都能够通过该平台有效协商与沟通。

结语: 海峡两岸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产生误解与偏见,但许多时候是由于双方彼此不够了解,以及受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认知不一。两岸社会在“三通”后的交流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双方的差异虽然随着交流时间的拉长、形式的多元和内容的丰富而有所减少,但是台湾青年对大陆的国族认同渐行渐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普遍认为,文化中国并不等同政治中国,历史中国亦不必然就是未来中国,所以没有“分久必合”那回事。台湾青年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降低是绿营栽下的“台独”意识的结果。自1990年代开始,学校与媒体两样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国退民进,去中课纲、绿媒当道,误导灌输台湾莘莘学子。正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所言,“天然独”其实是“人造独”。所幸网络新媒体应运而生,具有超强的穿透力,能够锁定目标对象,并强化其使用黏性和培养其使用惯性。媒介、渠道、平台都有了,如果内容合适,应能达到传播、沟通、宣传与说服的涵化效果。同时,善用“数位原民”的特质属性,经由网络新媒体开展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对话倾听,可以增进了解彼此的能力,达到求同化异的效果,建立双方血缘相亲、地缘相近、国族情感下崭新的集体记忆。因此,打破过往因为历史因素导致的隔阂,建构“两岸认同”,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来建立“两岸一体化”的文化架构与生活方式,进而真正实现“两岸一家亲”和达成心灵的确实融合。

[参 考 文 献]

- [1] 郑 剑 《对两岸青年交流的几点建言》,载《现代台湾研究》2016年第6期。
- [2] 台湾竞争力论坛《蔡政府施政全国民调发布会(二)20180731》<http://www.tcf.tw/9191-2>
- [3] 《2018〈天下杂志〉国情调查:年青人外逃,“台湾人”认同创新低》,<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7302>
- [4] 林声巧《两岸青年交流应走出媒体舆论场》<https://mp.weixin.qq.com/s/9maZ2T8OV7XoZkTHonrTSw>
- [5] [8] 张宝蓉《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困境——基于学校教育的视角》,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
- [6] “新台湾国策智库”:《马习会与2016选情观察》,<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BrainTrust/posts/“马习会与2016选情观察”趋势调查发%EF%BF%BD/1070329022998953/>
- [7] 台湾政治大学《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 [9] “陆委会”:《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活动之研究(摘要)》,<https://ws.mac.gov.tw/001/Upload/295/refile/7845/72669/e3c467ac-5ff3-44e6-b0b8-d2ffe726c293.pdf>
- [10]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 Vol. 9(5), pp. 1-3.
- [11] [13] 张峻豪《网络崛起因素与两岸关系》,载《展望与探索》2018年第16期。
- [12] 《创新思维 深化两岸青年交流》<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30001106-260310>

(责任编辑:刘向宁)